

集体为本:失地老人的资产建设和福利生产*

——以闽南 M 社老人俱乐部实践为例

魏爱棠 吴宝红

[摘要] 本文以闽南一个自然村落的“老人俱乐部”实践为例,探讨城镇化背景下失地老人实现资产建设和福利生产的动力机制。本文发现:失地老人通过发挥其独特的“集体主义文化优势”,以“集体参与公共福利生产”为目标,运用“培育集体联结”的策略,将村庄中就业困难的中老年人、废弃的小块杂地、老人个体手中的养老钱等看似零碎无用的资产与村庄中较强的社会关系网络资产整合与重构,实现了生存与发展、群体与社区之间良性的需求整合与福利循环。因此,本文提出失地老人福利保障应重视“集体为本”的资产建设模式,政府应超越传统制度性保障的视角,对老龄政策与失地农民保障政策做一定的方向性调整,促进社区在解决失地老人福利保障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 失地老人;集体为本;资产建设;福利生产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863 (2019) 02-0066-06

一、问题提出

传统上,土地是缺乏生活保障的老年农民安度晚年的“保命田”。^[1]然而,随着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和城郊土地逐渐被征用,失地的老年农民群体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由于年龄限制,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完全不具备竞争优势,根本无法与涌入城市的外来青壮年务工人员相抗衡。因此,这不仅影响失地老人的生活状况,^[2]而且也显著降低失地老人的主观生活质量。^[3]在这样的背景下,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成为政府和学界的关注焦点,也促使各地实践出不同的社会保障模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土地换社保”的嘉兴模式、“土地入股征地企业”的南海模式。^[4]也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自由资金保值、增值等来解决失地老人的养老保障难题。^[5]然而,上述这些模式大多依托政府的社会保险体系,强调“兜底”功能,保险水平较低,且保障形式单一,只能满足失地老人的基本需求。商业保险虽然有其优势,但也都是基于以消费为本的基本保障,单纯关注增加收入,并不能顾及失地老人的社会救助与社会服务需求。更进一步说,

已有的这些模式根本上是将失地老人当作纯粹的被照顾者和福利消费者,忽视了他们年龄虽老却可能拥有独特的问题解决能力。事实上,在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许多失地群体并不都是完全依赖政府的福利救助与保障,他们积极发挥自身能力,生产与创造更多的福利资源以解决自身问题。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丰富的社区实践,深入探索失地群体应对养老保障挑战中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应对方式这一过程,将对我国创新失地保障机制,缓解城镇化过程对失地老人生活的冲击提供更多的选择。

二、资产建设:从福利消费到福利生产

资产建设(Asset building)是欧美社会政策反思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最初由美国学者迈克尔·谢若登提出。他反对反贫困政策只关注保障穷人基本消费,认为这种社会政策是以收入为本的,它只能暂时缓解穷人的生活困难,并不能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同时,他提出政府应摒弃过去福利政策中穷人只能够拥有最低消费的观念,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引导和协助穷人进行资产积累与投资,增加穷人由福利依赖向福利自我生

* 基金项目:教育部一般项目“赋权视角下的城中村社区认同重构:城中村社区博物馆的行动研究”(编号:15YGA840017);厦门大学校长基金项目“城中村流动人口与原住民关系的人类学研究”(编号:20720151185);厦门大学繁荣社会科学计划
作者:魏爱棠,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吴宝红,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厦门 361005

产转化的可能性。^[6]资产建设的社会政策模式关注穷人的优势和能力,强调穷人的参与性和能动性,要求他们参与到资产形成、建设、运营的整个过程中,通过参与实现个人与家庭的能力发展。^[7]

资产建设在过去的10多年间也被引入中国的社区实践研究。如新疆的“呼图壁模式”^[8]、云南的“绿寨实践”^[9]、四川的“清平乡资产建设发展模式”^[10]、上海的“低保家庭青少年教育专项家庭发展账户”。^[11]相对而言,资产建设概念模型尚较少用于失地老人养老保障研究,仅有张友琴,^[12]姜丽美^[13]等人在社会政策层面有过一些相关探讨。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国内资产建设社区实践研究大多局限于农村反贫困、灾后重建以及城市贫困救助等领域,针对失地老人的资产建设社区实践研究几乎是空白。并且,国内现有资产建设实践的研究大多立足于外来专家的专业干预,少有关在地人群在福利生产过程中自下而上的自主行动。

本文将以M社老人俱乐部的发展实践为例,运用资产建设理论视角,来分析失地老人如何透过自主参与的社区行动过程来实现福利生产与养老保障问题的解决。虽然M社老人俱乐部的发展过程并非一个基于资产建设理论设计的社区干预案例,但M社老人俱乐部的发展过程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资产建设过程,基于资产建设理论的分析将能够为其他地区失地老人养老保障和福利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M社位于东南沿海的H市,属于L社区居委会辖下的一个自然村。现有户籍人口496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112人。本文全部的研究资料都来源于课题组在2015-2017年间与L社区居委会合作建设M社村庄博物馆项目过程中,所访谈的11位参与老人俱乐部建设的失地老人的口述史资料分析,这些受访者包括老人俱乐部创始会员、理事会成员、管理小组成员以及前村支书、村小组长。

三、失地老人的资产建设实践过程

(一)传统村庙组织的现代公益转型

据M社老人所言,老人俱乐部其实孕育于村庙管理委员会。1992年初,M社村民在老归侨BS的倡议下决定重建村庙。M社中较有声望的老年精英逐步被整合到村庙管理委员会中。退休返乡的老党员ZH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村庙管委会,但因他在此过程中无私协助老人们解决问题,仍赢得了以BS为首的村庙管理委员会的尊重与认可。村庙建成后也为老人们提供了一个日常聚会的公共空间。1992年M社土地被全部征收以后,老党员ZH看到村庄中大量50岁以上的失地老人失去生活来源又难以再就业,就与村庙管委会主任BS商量“不能让村庄那么多劳力闲置,我们老人也带头做点什么吧”。^①这个想法得到了当时村庙管委会14名成员的积极支持。但是,考虑到村庙添油钱的收入来自全村家户,支出也必须面向全村的公共活动。而老人创业只是为了解决老人的养老福利问题。若以

村庙管委会带领老人创业,则容易出现福利享受人群范围不清问题,可能导致代际矛盾。因此,同年重阳节,老党员ZH与村庙管委会主任BS、老生产队长YS商议决定,以这14名村庙管委会成员为核心,成立了一个新的公益性老人创业组织“M社老人俱乐部”,确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为村庄老人赚取一份养老钱。并且,明确老人俱乐部服务的受益对象是村庄全体老年人,所有参与者义务参加劳动,一应收支受俱乐部全体成员集体监督,参与者不得从中谋取私利。从此确立老人俱乐部与村庙管委会以及一般经济组织不同的性质属性与财务管理制度。不过,由于当时无任何政策支持老人事业,老人俱乐部成立之时是一个只有名字和一群老人的“空壳组织”,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二)由空壳组织向经济实体过渡

随着M社附近高新产业园区发展,外来人口剧增,老人们敏锐地发现村庙旁的大榕树下常有外来小贩聚集路边卖菜。于是,首先商量在村庙旁杂地上搭建简易菜市场,引导商贩进市场经营。既改善了交通秩序,又能增加老人创收机会。他们每人拿出100元钱,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募集启动资金以开展建设。老党员ZH与老归侨BS率先垂范志愿服务,并常常自愿为参与创业的穷苦老人支付伙食交通费用。老生产队长YS则捐出9条大石板作为简易菜市场的摊位。当时恰逢M社所在村庄决定进行整体规划,老人们便与当时的村委会和村小组协商,将村庙旁的杂地划拨给老人组织集体创业。村委会本着“老人是最弱势的,谁没有老的时候,集体组织有责任优先照顾弱势”^②的原则,最终同意将邻近村庙的杂地正式划拨给老人俱乐部建设农贸市场。农贸市场的建立与经营成为M社老人俱乐部资产建设的“第一桶金”。村庄的其他老人们看到了“农贸市场”经营带来利益,纷纷加入老人俱乐部。

1995年,M社所在村委会决定主动配合区政府开展村庄规划试点。M社老人俱乐部积极协助村委会控制个人随意占地行为,支持村委会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村委会则进一步将村民宅基地重新规划盘整后留出的小块杂地拨给老人俱乐部作为老人创业基地,老人们再次通过老人集体筹资和投入既有经营所得建成老人俱乐部楼。除留部分公共活动空间外,其余部分投入经营。当1998年老人俱乐部决定翻建原宗族祖厝作为老人幸福楼时,村庄的老人全部自愿加入老人俱乐部,使老人俱乐部真正发展为一个能够代表村庄全体老人的集体组织。1998年,老龄委正式提出各级政府要支持发展老人福利事业。在这个背景下,村委会再次规划土地给老人俱乐部建设“老人文化中心”和门球场,进一步完善村庄老人的福利设施。

(三)资产运营制度化

在所有可利用的土地资产开发接近尾声之时,老

① 2015年8月25日M社村民SN老人口述史访谈记录。

② 2016年9月4日M社村民前支书HZ口述史访谈记录。

人俱乐部开始把资产的运营常规化、制度化。2000年,老人俱乐部开始正式建立理事会,并制定老人俱乐部章程和基金会章程。历经五次修改后,老人俱乐部的运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老人俱乐部章程明确规定凡M社户籍老人男满60岁、女满55岁一次性交纳100元会员费及1000元基金会基金即可取得会员资格并享有会员的权利,老人俱乐部基金会全部收入用于老人福利事业,在资金足够时也考虑本社的特困儿童及公共福利费用。理事会成员15人,包括创会成员、退休党员、村委员及村小组代表(实际上也兼顾各家族代表的平衡),设主任、副主任、会计、出纳和保管各1人,主任、副主任每届任职3年,由理事会成员选举产生。理事会成员负责着老人俱乐部的日常经营事务,参与日常经营管理者每月补贴1000元。在费用方面,象征性会费收入、经营性收入构成了该组织的费用来源。在资金使用上,要求凡超过1000元以上的开支都必须由俱乐部理事会成员集体讨论决定,报账需经4人审核才能通过,形成了完整的财务管理制度。

四、资产建设中的福利生产

(一)老人福利效应

老人俱乐部在资产建设和资产运营中,始终以村庄中所有失地老人为主体,对其提供多种类型的保障与福利。包括:1. 生活保障。每人每年发放生活保障费6600元以及两次大米和食用油;2. 健康保障。每年邀请医师开展4次养生讲座,为生病老人提供200-1200元/人/次住院补贴;3. 文化娱乐。修建门球场,组织老人门球队、太极拳队并聘请专业教练培训;4. 社交活动。支持老人代表M社外出参与各类体育赛事、宗亲及信仰交流活动,迄今已获各类老年体育赛事奖100余次,参与宗亲信仰活动足迹遍及菲律宾、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5. 调解维权。在老人遭遇家庭纠纷时,代表地方长辈积极出面维护老年人权益;6. 协助家属料理丧葬事务,并给予每人4100元的丧葬安置补贴。

老人俱乐部自主发展的福利资源成为政府、村集体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基本上保障了M社失地老人的生活安全。老人们说,有了这笔养老钱,即使孩子不给赡养费,他们也能维持独立的生活开支了,不必处处看小辈脸色。并且,通过不断的行动参与,也使得参与的老人提高了自身的人力资本,学会了经营管理、沟通交流以及各种健康活动技能,更使他们在家庭和社区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权利保障,提升了老人群体的尊严与地位。相比其他村庄,M社老人更愿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对社区发展具有更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组织福利效应

老人俱乐部的资产建设和资产积累,也为该组织自身发展带来了福利效应。具体而言,1. 提高组织运营和创新能力。资产建设过程中,M社老人俱乐部不

仅形成了一个工作能力和凝聚力很强核心团队,而且通过不断提升其组织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为后期老人俱乐部持续创新资产运营模式和满足村庄老人不断增长的福利需求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老人俱乐部的福利提供目标开始从最初的生活保障逐渐转移到提供直接的福利服务,甚至开始探索引进专业资源协同办理村庄老人日间照料中心;2. 积累组织社会资本。老人俱乐部为村庄中所有失地老人平等提供各种福利保障,得到老人们的普遍信任与支持,增强了老人组织的凝聚力。随着资产的累积与福利提供能力的提升,借助于传统宗族、庙宇以及社区文体活动的交流网络,老人俱乐部成功地占据了联结村庄老人与社区外更多资源网络的“结构洞”位置,^[14]扮演着老人社区参与资源经纪人的角色;3. 增加组织政治资本。透过资产建设的过程,老人俱乐部与村委会、村小组建立了互惠协同的合作关系。一方面,村委会、村小组支持老人俱乐部的资产建设;另一方面,老人俱乐部也帮助村委会、村小组改善社区基础设施、协助提供社区福利、疏导负面社会情绪。当然,这一关系反过来提升了老人俱乐部在社区居民中的影响力与政治话语权,使它成为M社所在社区多元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

(三)社区福利效应

老人俱乐部的资产建设不仅保障了失地老年人群体自身的福利,也增加了社区整体的福利供给,延伸了后代福利。包括:1. 社区危机协调。在地铁爆破建设中,不少村民楼房受损,与相关方爆发了严重冲突。作为民间组织的老人俱乐部,比行政性色彩浓厚的居委会更接地气,村民更愿意把老人俱乐部当作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支持老人俱乐部代表村民通过信访程序联系街道及相关方参与调解。加上其作为村落传统权威的角色,能够较好地依靠民间的人情事理来约束个别村民的过激行为,促进村民理性参与调解。老人俱乐部策略性地与社区居委会、街道一起构成分解社会压力的连续体,^[15]因此也使M社成为当地多元治理的社区典范;2. 社区安全守护。面对外来人口聚集导致治安压力剧增,老人俱乐部组织老人巡逻队,每天定时巡逻,还动员和支持年轻村民加入夜间巡逻,协助组建村庄巡逻队,甚至捐建全村的监控系统,协助社区居委会营造安全环境,使M社成为远近闻名的治安模范村;3. 社区公共福利资源供应。M社老人俱乐部捐资100多万建成门楼、池塘安全栅栏;组织妇女腰鼓培训;捐助社区慈善驿站;提供奖学助学;出资举办青少年篮球训练营,支持培育M社青少年篮球新生力量,至今已举办5期。这些行动促进村庄内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团结。M社从当地最穷的一个村庄变成现在的城中村典范。

五、资产建设的内在逻辑

(一)内在的集体文化动力

深入分析M社老人俱乐部的资产建设过程发现,

老人俱乐部的发展起点是“村庙重建”。在闽南文化传统中,村庙象征着村落共同体,它与代表宗族的宗祠一起构成了村落生活中的“公家”^①主体。村庙的重建激发了M社不同家族对这片生活土地的乡土意识,使得M社各家族跨越个人及家族利益的界限,复兴了闽南村落文化传统中集体主义的“公家”概念。出于对村庄的关心和对神明的信仰,M社不同家族的老年精英建立了第一个自组织——村庙管理委员会。换言之,村庙管理委员会的出现,给了村庄老年精英一个舞台,使他们能够运用村落文化传统把分散的个人及家族重新整合起来,实现了社区意识的初步重建。它为后续失地老人进一步展开以问题解决为目标的社区行动奠定了基础与动力。然而,真正开启M社失地老人资产建设引擎的社区行动主体并不是村庙管理委员会,而是M社老人俱乐部。老人俱乐部在早期发展阶段曾包含3个核心人物:老党员ZH、老归侨BS和老生产队长YS。ZH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BS曾是成功的企业家,他们都对共产主义怀有坚定的信仰;而YS在M社当了30多年的老生产队长,他不断教育群众“输人不输阵”、“勤劳齐心不计较,有钱大家一起赚”,^②使M社在生产队时代就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团结村庄。

不同于村委会的集体经济组织模式是以股份形式组织集体资产的筹资与经营,老人俱乐部最初其实主要是按照早期生产队的实践模式并参考海外公司经营的经验,来组织老人俱乐部这一集体生产组织。他们明确老人俱乐部全部资产归M社全体老人集体所有,经营所得全部用于老人集体的福利支出;强调平等的成员资格,不论他们是否出资参与建设,所有成员不因其提供资金数量差别、参与时间不同而拥有差别性的权利待遇。M社老人俱乐部前主任LP曾说,当年ZH和BS出最多的钱给大家做建设,却从没享受过一分的福利,他们总是说,参与老人俱乐部就是要“团结拼搏,无私奉献”。^③可见,M社老人俱乐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浓厚的集体主义色彩。促进这些老人自觉参与社区行动的根本动力,在于地方与社会文化传统所共同强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正是这样内在的集体文化动力直接实现了村落中多元老年精英整合参与。因此,从本质上说,老人俱乐部是在朴素的乡土意识与过去那个时代的集体主义文化观念相互融合基础上,建立的一个强调通过集体主义实践方式来解决自身问题的失地老人互助性社团。

(二) 集体参与的资产导向

回溯老人俱乐部的实践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村落中那些被忽视、闲置或淘汰不用的资产在老人集体参与的过程中被串联起来,重组成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老人俱乐部一开始所利用的人力资源全部都是劳动力市场所排斥的年龄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他们所争取获得的土地资产也是村庄在规划发展用地和宅基地外零碎的小块杂地,而这些杂地与其他城中村发展中往

往不受关注,以致成为村民个人违建扩张的资源;他们所依靠的启动资金来源是看似无足轻重的老人个体手中的微薄养老金。但是,通过发挥老人群体蕴含的、丰富的地方知识以及经营管理能力,他们找到了菜市场这个突破点,为老人们建构了一个美好的愿景,促成了更多的老人愿意投入,实现了分散的老人群体网络资源的盘整与重组。他们利用其在村庄中的传统权威和人际网络,来促成相关个人家庭与村委会达成相互妥协的规划共识,使老人组织获得的零碎土地资产得以整合成块。最终鼓励老人们一人一份分摊凑出建设资金,完成老人创业资产的累积与扩张。很明显,在这个资产建设过程中,老人俱乐部透过扩大集体参与,带动既有的人力、土地、资金和社会关系资源的流动与交换,从而使这些之前被废弃的资产得以重组形成可资利用的发展性资源。集体参与和资产导向成为老人俱乐部资产活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 集体关系联结的强化

老人俱乐部集体参与的方式是带动村落中既有关系网络的联结,并且在资产建设过程中,他们也致力于去培育和强化村落中与他们相关的各类关系网络联结。老人俱乐部运作的基础是自然村落——这个具有乡土认同、凝聚团结记忆基础的地缘性小集体。他们最初依托的组织是义务性的村庙管理委员会。借助这个地缘性信仰组织,他们汇聚起老人精英,重建了村落中不同家族的关系整合。同样,他们利用家族的关系网络来促进老人俱乐部与村委会及村小组之间的关系联结。老人俱乐部创始会员SN说,当年ZH的儿子和BS的儿子分别是村小组长和村委,所以由他们出面找了村里协商划拨零碎杂地给老人做创业基地的事。^④当村小组开会讨论这些事时,这些老人们就一起出面让青壮年人认同“谁不会老,人人都会老,所以现在支持老人就是支持以后的你们自己”。^⑤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最终使村委会和村小组同意了老人们提出的“集体优先”和“以老人集体来保障老人权益”^⑥的原则,以组织性分配土地的方式来支持老人组织发展老人福利事业。此外,当老人自身基本保障需求满足之后,老人俱乐部开始有意识地投入资源培育他们与青年、妇女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强化他们与社区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以他们的话说,村里这些土地给到老人,我们老人也要回报付出,让村庄中其他的群体也有所受益,这样大家才会理解支持老人事业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关系的联结促进资源的流动与再生产,资源的流动又带来更强的关系的联结,构成了一个群体与社区之间

① 此处“公家”是闽南民间对村庙宗祠等具有集体性内涵的地方文化主体的说法,并非指公有制经济下的集体。

② 2016年8月25日M社村民ZJ口述史访谈记录。

③ 2015年4月17日M社村民LP老人口述史访谈记录。

④ 2015年8月25日M社村民SN老人口述史访谈记录。

⑤ 2016年3月29日M社前村小组长HG口述史访谈记录。

⑥ 2015年10月19日M社老人俱乐部现任会长SM口述史访谈记录。

良性的福利关系循环。

(四) 制度建设的集体保证

如上所述,早在20年前,M社老人俱乐部就已经运用俱乐部章程、全体会员大会、理事会制度、财会制度来明确理事会工作的程序与权力范围,规范管理团队的行为。有趣的是,他们并不止于从法律制度层面来监管管理团队的行为。他们还借助村庙神明的道德信仰与村落文化中的“公家”传统,来建立一些基本的管理原则。比如他们强调老人俱乐部源出村庙组织,老人俱乐部收入与村庙添油钱同属村庙“菩萨钱”。“菩萨钱贪了遭神报应”、“公家钱拿了无脸见人”。^①他们把老人俱乐部的管理制度与村落传统信仰道德相联系,以人对神明的畏惧之心、对邻里宗族的“面子”和羞耻感作为制度建设的价值基础,强调为老服务是积功德,也是在村落生活中个人声望的具体体现。我们很清楚地看出,老人俱乐部建设立足于现代社团制度,同时扎根于乡土社会的文化习俗,最终在制度建设上形成了基于集体主义文化与现代意义上的集体决策制度的双重控制与约束。

当然,从宏观层面来看,M社老人俱乐部成功的资产建设与福利生产之所以成功,也离不开当时天时地利的外部政策、社区经济条件的哺育。首先,M社老人俱乐部的发展正好是周边工业园区开发建设的成长时期,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创造了一个增长迅速的市场,构建了他们资产建设的有利条件,使他们得以抓住这个机遇,开展了以土地为基础的资产积累与扩张。其次,我国政府于1996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提出农村地区可以将未承包的集体所有的部分土地、山林等作为养老基地,收益供老年人养老,使老人的集体资产建设获得了必要的政策合法性支持。

六、结论

(一) “集体为本”的失地老人资产建设模式

综上,失地老人群体在特定的政策及社区经济条件下,以自然村为基础建立公益性的老人集体组织,通过资产建设的途径是完全可能实现福利生产、需求满足与能力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弱势的失地老人也可以是自身问题解决的专家。另一方面,相比西方资产建设社会政策及社区实践重视以个人及家庭为本的资产积累路径,M社老人俱乐部的实践则非常契合中国特色的文化脉络,更把中国独特的集体为本的资产建设模式的内在动能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个“集体为本”资产建设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三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它是一种基于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福利实践。它的基础既建立在自然村落的“公家”文化传统之上,也扎根于计划经济时代充满社会主义集体价值观的生产队实践记忆之中。村落中老人群体独特的集体主义生命经验成为他们福利实践最大的文化优势,他们也以这种文化优势来保证维持其制度运

作中的集体性特征。其次,它是一种以“集体参与公共福利生产”为目标的福利实践。它从一开始就明确所有参与者必须认同“公共福利生产”的组织行动目标,老人俱乐部组织不以追逐个人利益的股份分红为目标,强调照顾弱势与公平分配,重视动员村庄中每一位老人的参与,重视通过参与促进老人群体的凝聚、互助与能力发展,通过集体实践来满足老人个人的生活保障需要和创造公共福利改善的基础。再次,它是一种以生产培育“集体联结”为策略的福利实践。M社老人俱乐部的福利实践之所以能够成功,根本上在于他们始终坚持从个人或组织、群体之间的关联性出发,强调彼此之间的关系联结与正面协作,从而实现老人群体—个人—社区之间反复的、多层次性的福利生产良性循环。无论是最初以“一起赚养老钱”凝聚老人参与、早期老人组织与村委会、村小组之间所达成的“老人最弱势、谁都会变老”的共识,还是之后老人组织反哺社区对儿童青少年福利和妇女福利以及社区公共福利的付出,他们都在致力于明确老人与相关群体、组织之间的集体共识,致力于培育与强化他们与相关群体、组织之间的正面联结,建立村落的集体认同感。因此,“集体主义文化”、“集体参与公共福利生产”与“培育集体联结”构成了“集体为本”资产建设模式最重要的特色。

(二) 失地老人福利保障的政策启示

由M社老人俱乐部案例可见,对失地老人养老保障问题解决政策主体的关注不应只局限于政府,更应关注社区或村委会层面政策实践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归根结底,M社老人俱乐部的成功归因于其所在社区(村委会)的实践智慧。他们立足于群众需求,以弱势福利保障为目标,在一般股份制社区集体经济模式实践之外,愿意支持那些具有浓厚集体主义思想的老年精英探索一条不同于个人股份制集体经济模式的集体性社区福利组织模式,创造性地将自然村熟人社会的组织基础和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与失地老人自助性的福利生产行动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建构起多层次良性循环的福利生产与社区治理模型。因此,政府针对失地群体的社会政策,应考虑超越提供制度性保障的视角,进一步关注如何创造社区积极承担失地老人养老保障责任的支持性政策环境,来促进社区多元主体发掘自身能力,与政府共同承担失地老人养老保障的社会责任。

具体而言,政府在老龄政策与失地农民保障政策方面可以采取一定的方向性调整。就老龄政策来说,应超越老人群体仅仅是一个需要被照顾之弱者的观念,重视党组织领导下的老人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引导,重视社区中老人群体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社区老人精英尤其是老党员的带头作用,促进老人社区社会组织透过集体参与,提升老人自我福利生产与自我

^① 2015年10月19日M社老人俱乐部现任会长SM口述史访谈记录。

服务能力,改善社区老人问题处境。就失地农民保障政策来说,可以考虑在城中村集体资产经营分配中尝试运用“集体土地分配给集体”的原则,允许村庄中代表特殊弱势群体的社区社会组织在“集体参与公共福利生产”的前提下,持有一定的集体土地或集体资产的使用经营权,倡导集体性、公益性的社区福利组织模式,鼓励社区内多元主体在社区党组织的监督领导下共同参与提供公共福利资源。当然,这类生产性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应特别重视从社区具有一定凝聚意识或团结基础的关系网络出发,并致力于培育和扩展社区中的居民、组织及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与团结。关注团结是集体为本失地老人资产建设的价值基础,也是其根本目标,更是其不同于一般福利提供模式的独特价值。①

[参考文献]

- [1] 张时飞. 为城郊失地农民创造一个可持续生计——宁波江东区的调查与思考[J]. 公共管理高层论坛, 2006(2).
- [2] 杨金龙. 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代际差异及其分类管理机制[J]. 山东社会科学, 2016(11).
- [3] 仰和芝, 张仰君.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公共卫生, 2016(2).
- [4] 邓元慧. 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模式经验及借鉴[J]. 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8(22).
- [5] 刘英泽, 王慧, 赵艳芹, 孟文静. 城中村失地居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 2009(2).
- [6] [美] 迈克尔·谢若登. 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M]. 高鉴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118-138, 181.
- [7] 侯志阳. 兰村福利——资产建设与农村社区福利研究[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25-67.
- [8] 郭葆荣, 郭新才, 邹莉. 呼图壁模式: 我们学到了什么[A]. 邓锁, [美] 迈克尔·谢诺登, 邹莉等. 资产建设: 亚洲的策略与创新[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37-146.
- [9] 古学斌. 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的介入[A]. 王思斌.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29.
- [10] Ting W.F. Asset Building and Livelihood Rebuilding in Post Disaster Sichuan, China.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3(2).
- [11] 吴世友, 朱眉华, 苑玮烨. 资产为本的干预项目与社会工作实务研究设计——基于上海市G机构的一项扶贫项目的试验性研究[J]. 社会建设, 2016(3).
- [12] 张友琴.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初探——以“土地换社保”到“以土地样社保”[C]. “资产积累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4.
- [13] 姜丽美. 资产建设——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的突破点[J]. 理论导刊, 2010(6).
- [14] [美] 罗纳德·伯特. 结构洞: 竞争的社会结构[M]. 任敏, 李璐, 林虹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08. 18-20.
- [15] 朱智慧. 资产建设视角下的城中村老人社区福利模式——以厦门市L村为例[D]. 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

(责任编辑 王跃然)

Collective-Asset Building & Welfare Production of the Lost-Land Elderly: the Practice of Fujian M-village Elderly Club as an Example

Wei Aitang Wu Baohong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practice of Fujian M-village Elderly Club as an example, using oral history to explore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asset building and welfare prod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It finds that the elderly can play an active role in solving their own security problems. By having taken the advantages of collectivist cultural assets, they succeeded in achieving the goal with the strategies of collective participation and collective connection. The integ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idle or eliminated assets and the strong social networks in the village have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needs and welfare production cycle in the community.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s social policy for the lost-land groups should go beyond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institutional safeguard, and further focus on how to create a supportive policy environment for the community to actively assume securit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lost-land elderly, so as to promote the community's willingness to share the social welfare responsibilities with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the lost-land elderly, focus on group, asset building, welfare production

[Authors] Wei Ait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Wu Baohong is Ph.D Candidate a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